

铁腕太后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慈禧
政治强人，垂帘后面的大清主人

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云际会，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鲜活生动的慈禧。阐释帝王的是非功过，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

玮
珏
◎
编著

慈禧

线装书局

铁腕太后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慈禧
政治强人，垂帘后面的大清主人



玮
珏◎编著

慈禧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腕太后——慈禧 / 玮珏编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3. 12

ISBN 978-7-5120-1142-7

I. ①铁… II. ①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494 号

铁腕太后——慈禧

编 著: 玮 珏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 版: 腾飞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0

印 张: 48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Mu lu



第一章	兰儿格格入宫	1
第二章	后宫来了兰贵人	29
第三章	咸丰年洋夷英军入侵	78
第四章	国难当头 随咸丰帝逃亡	129
第五章	巧机缘 懿贵妃垂帘听政	165
第六章	立权威 慈禧杀一儆百	210
第七章	夺权争势 宫廷风波再起	250
第八章	同治帝选嫔妃	306
第九章	铲异己 慈禧锋芒毕露	355
第十章	一代听政专权的落日	404

第一章

兰儿格格入宫

第一章

兰儿格格入宫



通经悉史,是慈禧少女时代最值得称道的品德,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所必需的课程。这些,使得慈禧踏入政坛后能够知前鉴后而有所为,使她有了宫廷竞争的资本,有了把政敌击垮取得胜利的基础。

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小字兰儿。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出生。父亲惠征,官运还算可以,由道光十一年(1831)的八品笔帖式,历迁吏部文选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山西归绥道道员、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为官十七年,由八品升至四品,变成主管一方行政的要员。母亲富察氏,是一个普通的妇女,整天为一家人的生活操劳奔波。慈禧兄妹共四人,兄弟二人是照祥、桂祥,照祥虽为长兄,但并没有发迹,史书乏载,事迹不详。桂祥可能是沾了慈禧点儿光,虽然没有就任高官,倒也在官场上混了几年,结交了许多官友。妹妹叶赫那拉氏在得宠以后,受咸丰之命,“奉旨”与醇亲王奕譞完婚,成了王爷的福晋。

在慈禧和她的兄妹中,不管是从相貌,还是从才能上,慈禧都出类拔萃。对于慈禧的相貌,正史上并没有做详细的描绘,而且,对于少年时代的慈禧,又多无记载。如今我们只好借助一些野史、笔记的材料来观其一斑了。《清朝野史大观》上有这样一段记载:“西后(即慈禧太后)垂髫时雅好修饰。……西后每一出游,道旁观者皆喃喃做欢喜赞,谓天仙化身不足过也。”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少女时代的慈禧的确是“天生丽质”,美丽超群。也可能是她太“雅好修饰”会保养的缘故,直至年逾古稀,仍风韵犹存。这可从当时在慈禧身边为女官的德龄与曾为慈禧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的记述中得到答案。德龄这样赞叹道:“太后当伊在妙龄之时,真是一位风姿绰约、明媚鲜丽的少女,这是宫中所深深



称赞的；就是伊在逐渐给年华所排挤，入于老境之后，也还仍然保存着好几分动人的姿色咧！”

卡尔女士在其所著《清宫见闻杂记》中记载了如此一些描绘：予相皇太后面貌，乃一极美丽和善之夫人。度其年事，不过四十而止。（实际上慈禧那时已经六十九岁）……太后全体各部，极为相称。面貌之佳，适与其柔荑之手、苗条之体、黑漆之发，相得而益彰。盖太后广额丰颐，明眸隆佳，眉目如画，樱口又适称其鼻，下额极广阔，而并不带有一毫顽强态度。耳官平整，齿洁白如编贝。嫣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予若不知其已臻六十九岁之寿者，平心揣之，当为一四十许之美妇人。太后精神焕发，神采照人。可知其平日居气养体之安适，决非常人所能及也。加以明珰满身，珠翠盈头，其一副纤丽庄严之态度，真乃笔墨所难得形容也。

从德龄与卡尔的描绘中，可知慈禧虽没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却是一个不可多见的美丽女子。抛却记述，再观画像。不管从卡尔所画的彩画上，还是从照相机摄下的相片中，我们都能够看出，年逾花甲逼近古稀的慈禧，无愧于“美妇人”之名。

慈禧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隶属八旗（初录镶蓝旗，后加入镶黄旗），这便注定了她必须加入选秀女行列的命运。按照清制，“每三岁选八旗秀女”。这些秀女的挑选对象主要是八旗子女。据《养吉斋丛录》载：“旧制：挑选秀女，皇后及内廷主位之亲姐妹皆免挑。凡八旗官员兵丁闲散之女，皆备挑选。……八旗挑选秀女，或者备内廷主位，或者为皇子、皇孙指婚，或者为亲郡王或者亲郡王之子指婚，典礼各有等差，而挑选之制则无异。”

慈禧有备选秀女的“义务”，又是天生丽质，中选入宫则为必然。因此当大清第七代皇帝（入关后）咸丰下诏选秀女时，年已十七的慈禧被选中，并于次年五月入宫，变成咸丰皇帝的贵人。

慈禧在少女时代的生活情况，因为史籍缺载，无言其详。然而从零星的资料中，我们至少能够知道如下两点：

一、慈禧是一个天资聪明、十分好学的人，对经史很感兴趣，所以致力最深。“年十六岁时，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这为日后垂帘听政打下了基础。

二、慈禧并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也没有优裕的生活条件。慈禧出生于一个仕宦之家，有二兄一妹。中国古代是重男轻女的时代，儿子既可传宗接代，又可入仕为官，光宗耀祖，而女子则只能成为“生育工具”，至多为人“主内”。由此父母只重照祥、桂祥兄弟二人，轻慈禧及其妹妹二人也是自然的。父母对于儿子的要求尽量满足，而对女儿的要求经常难以满足，这是那个社会情理中的事。对于这一切，慈禧后来抱怨道：“自余髫龄，生命极苦，尔（德龄）所知也。以余非双亲所爱，尤觉毫无乐趣。吾姊所



欲,余必欲之,至于予者,靡不遭呵斥。”慈禧在这里所说的“生活极苦”,是相对来说的。如果与当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相比,生于宦宦之家,其福大矣!至少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也不用为衣不蔽体而羞见他人。然而如果与同一阶层的官僚们比,作为八品笔帖式的惠征,如果不中饱私囊、贪污受贿的话,靠一人收入既要养活全家六口,又要应付官场上的宴请送礼,实在也不宽裕。这对于自幼就爱好修饰的慈禧来说,很难满足其要求,其“苦”自不待言。

并不优裕的生活环境,不仅可以激发有志者的上进心,而且可以磨炼其意志。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才不致在逆境之中消沉,在困难面前低头。慈禧在家庭中不受双亲喜爱,也算是在逆境中长大成人;欲望面前到处碰壁,也可谓困难丛生。慈禧并未消沉,也未低头,她经受住了考验,不屈不挠。这为日后在逆境中崛起作了必要的锻炼。

二

慈禧以姿色被选入后宫,然而她并没有陶醉在自己的天然美丽中不能自拔,当她入宫后环顾四周,见到许多美丽绝伦的面孔时,毅然放弃单凭姿色取宠的幻想,在角逐中,她根据具体情况,揣摩咸丰的心理,适时调整取宠方案,十分准确地把握出击时机,终于力挫群芳,独占皇宠。

在慈禧得宠之时,后宫里的妃嫔们却怨声载道。曾经得过宠的人为失宠而迁怒于她。从来未受过宠的人,因“专擅”而抱怨于她,她成了后宫女人们的攻击目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慈禧与皇后钮祜禄氏发生了冲突,险些为此而遭毒打。

皇后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在咸丰继位之前她就成了咸丰的侧福晋,咸丰登基后,被封为贞嫔,过了不久晋封为贞贵妃,在孝德皇后去世后荣登皇后宝座,成为六宫之主。可是,就在钮祜禄氏地位升迁达到至尊之时,失宠的危机日益严重,造成这一危机的慈禧使皇后很不喜欢。

咸丰二年(1852),被选中的秀女入宫后,皇后钮祜禄氏对这些秀女中的一个印象最深,那就是长得美丽活泼的慈禧。因为她除漂亮之外,还有一点与别的宫女不一样,那就是她见了皇帝与皇后都是那样落落大方。从她的眼神中能够看出,这个秀女不是等闲之辈。一个争风吃醋的念头闪过,她竟劝咸丰不要收留她。但是咸丰置若罔闻,不但将慈禧选入宫中,而且颇加宠幸。皇后虽然不断地在咸丰耳边吹风,努力想从慈禧身边夺回咸丰,然而她的心思白费了,慈禧的手段比她略高一筹。皇帝还是照样宠



幸着慈禧，而且她的地位也由此不断升迁着。

皇后钮祜禄氏是六宫的主宰者，她对咸丰整天迷恋着慈禧很不满，她劝咸丰应该保重身体，咸丰付之一笑，这可气坏了皇后，她左思右想后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得意的好办法。

清朝的皇帝非常敬畏祖训，由于是老祖宗留下的制度，后代统治者往往奉为至高无上的法令。咸丰迷恋着慈禧，使皇后想起了祖训，她便想用祖训约束一下这个迷恋女色的皇帝。

皇后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太监，告诉他到慈禧住的储秀宫，如此这般。第二天清早，太监领令走到储秀宫寝门外念起了祖训。正在入睡的咸丰听到“祖训”二字，就急忙披衣起而跪听。这个太监是遵皇后之命而行的，他在寝宫门外诵祖训，一直等到咸丰帝走出储秀宫前往听政殿后才住了嘴。

皇后的办法还算灵验，咸丰怕听祖训，因此去储秀宫的次数减少了。可是，当钮祜禄氏放松警惕，储秀宫门外一切恢复正常后，咸丰又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他不但同以前一样经常去储秀宫，而且时常不早朝。皇后故伎重演，不知是咸丰已有思想准备，还是敢置祖训于不顾，反正他此次一反常态，听到祖训后一切照旧，那个念祖训的太监有时候还遭到皇帝的斥责。当他怀着满腹委屈到皇后那里交差时，皇后又让他十分难堪，下不了台。听到几次相同的回复后，皇后又气又恨。气的是皇帝迷恋女色，居然连早朝都免了，真不应该；恨的是慈禧以色取宠，致使皇帝不上朝听政。不能就这么下去！皇后在沉思后下了决心。她决定亲自出马，一是为了劝皇帝听政，二是为了惩治慈禧秽乱后宫。

咸丰六年（1856）春季的一天，清晨起床后，刚刚梳洗完毕，皇后便令太监将祖训拿来，承伺太监听到“祖训”二字就慌了神，因为这个东西已把他搞得太苦了啊！可是，懿旨已下，谁敢抗命不遵？不得已，这位太监小心地取来了祖训，愣愣地站在那里，显得手足无措。这也难怪，因为以往皇后都是在他捧来祖训之后，就会让他到储秀宫如此这般地诵读，今日却并未传旨让他去储秀宫。他不知道皇后要干什么，因此十分困惑。过了好一会儿，没想到皇后对那位愣愣地站着的太监说道：“跟我去储秀宫！”说毕便顶起祖训，急匆匆地奔向储秀宫。来到宫门外，皇后双膝跪地，高声叫道：“请皇帝起，听祖训！”咸丰和慈禧从梦中惊醒后，惊慌起来，他们没有想到皇后会亲自来，深知皇后此行非同一般。咸丰立刻起了床，急忙说道：“朕即听朝，勿诵祖训。”

咸丰匆匆上朝去后，皇后站了起来，吩咐身边的太监起驾前往坤宁宫，并传旨令慈禧一同前往。

听到皇后传旨，慈禧不免有些惊慌。她知道皇后要惩罚她了，因为，按照清制，坤



宁宫是皇后行使权力进行赏罚的地方。她看皇后怒气冲冲的样子,知道这一次受罚是肯定无疑了。无奈旨意已下,她不敢不去,于是慢慢地随皇后向坤宁宫走去。慈禧到达坤宁宫时,见皇后早就在正中的座位上落座,怒容满面地等待着她的到来。当她刚刚踏入宫门,就听到了责骂声:“你用什么妖术迷惑了皇上,皇上本是一个勤理政务、奋发图强的君主。自你进宫以后,皇上既不早朝,又不理政务。你可知罪?”

跪在地上的慈禧,这时候纵有千言万语也不敢说,即使有满肚子的委屈也不能言。她知道此时此刻的任何辩解都是徒劳无功。明智一点,只有“知罪”而已。

慈禧慢慢地抬起了头,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着转,然而没有掉下来,只见她把嘴唇一咬,说:“都是我不好,我知罪。”

皇后见慈禧“知罪”了,就接着命令道:“知罪就好,来呀,家法伺候,给我打!”

慈禧低下头,咬紧了牙关,双手却在保护着腹部。因为这里有她的希望所在,所以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委屈一下吧,也许将来生个阿哥就会好的。在慈禧静待受罚的时候,没想到咸丰来到了,免了她一场灾祸。

且说咸丰自储秀宫出去后,看着皇后怒容满面,便推测出今天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上朝之后,完全无心理政。当一个大臣出班奏太平军攻下武昌等事时,没等他说上两句,咸丰便挥了挥手说道:“所有军事,着军机大臣妥议具奏。”说完就宣布退朝,由于他心里还惦记着后宫里的事情,什么太平军、武昌,他才懒得过问呢。

咸丰退朝后,急忙传旨前往储秀宫,还没有挪步,就听到皇后驾幸坤宁宫的消息。咸丰一听“坤宁宫”三个字,便知道皇后意图所在,于是立即转往坤宁宫,他刚刚走进宫门时,就听到了皇后发出的惩罚令,他立刻高声吼着:“请皇后免责,懿嫔已有娠矣!”

由于皇帝出面说情,且有怀孕在身的理由,岂有不准的道理。皇后灵机一动,自己找了个梯子下台。只见她用带有责备的口气说道:“皇帝怎么不早说呢?”立刻便令慈禧起而赐座。

皇后钮祜禄氏因与慈禧争宠而欲下此毒手,慈禧因未失宠而得到了皇帝的保护,免了一场祸。由于慈禧得宠于皇帝,其地位也不断升迁。咸丰四年(1854)晋封为懿嫔,咸丰六年(1856)当她为咸丰生下大阿哥载淳后,就由懿嫔晋升为懿妃,过了一年,又升为懿贵妃,成了皇后之下、众妃嫔之上的后宫二号人物。

三

咸丰七年的慈禧是位外貌沉鱼落雁、内里沉毅刚强的青年女子,她在互相倾轧、勾



心斗角的后宫，为宠而争的生活竟有五个年头，这段宫廷生活冰冷无情，磨冷了她的热情，磨硬了她的心肠。

她虽然只有二十三岁，但好像经过了炼狱之苦一般，看透了人间的一切情感，显得成熟、老练。她使出浑身解数，从第五级的贵人，连跨三级，晋升为第二级的贵妃，（因为没有皇贵妃）在她之上，只有一位孝贞皇后。而孝贞皇后心地善良，淑性贤明，拙于心计。而懿贵妃为咸丰帝生育了唯一的皇子，且抱负远大，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咸丰帝当时只有二十八岁，当了七年皇帝的他，早已磨平了当初即位的锋芒。且身体不好，诸病缠绕，懒于政事。

这便为对政治极为敏感、极有兴趣、极其热衷的懿贵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心思灵敏，实过于人，其热心政权，亦独特秉性”。她利用有利的后宫地位，“时于上前道政事”，常常就国内外大事发表意见，时常引起咸丰帝的注意。她最关心的是国家领导权，即皇权的归属问题。她觊觎皇帝的权力，“渐思盗柄”。

从咸丰七年到咸丰十一年的四年期间，懿贵妃在北京禁宫和热河之行都干了些什么呢？这仍然是个谜。由于她当时处于后宫，因此这段时间关于她的记载少知又少。我们也只能从现存片言只语的记载来了解她当时的所作所为。

据《慈禧传信录》载：“一日帝御圆明园，共后妃宴天地一家春。酒半，枢府委，英法军已陷天津，帝痛哭起，罢宴。孝贞与诸妃皆泣，后独进曰：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付。帝乃召奕訢、肃顺共计之。訢主和，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如果费行简，只字不差，这应是1858年5月，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兵逼天津城下后，咸丰帝的宫廷的反应。这里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懿贵妃静观其变，颇有主见；第二，懿贵妃早就相信恭亲王奕訢；第三，奕訢明了世界大势及本国实力，因此主和，肃顺昧于世界大势及本国实力，所以主战；第四，咸丰帝对整个世界和本国的政治局势，知之不多，是和是战不知所措。然而综观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懿贵妃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参与了一定的国家政事。

但是，关于懿贵妃这段时间活动的最可靠的记载当属吴可读的日记《罔极篇》。吴可读，字柳堂，道光三十年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他在咸丰三年英法联军入侵天津、北京的时候，曾写了一篇日记。这篇日记一部分是写他的母亲在这前后患病故去的经过，一部分写咸丰帝及其大臣们对英法侵略军的态度，其中极其珍贵的是有五处提到了懿贵妃对咸丰帝北狩热河、对英军翻译主任巴夏礼、对英法侵略军的态度问题。而这五处记载和个处评价咸丰帝北狩的记载，在已出版的含有这篇日记的四种版本中有三种均被删掉了。被删的三种是：一为1893年刊本《携雪堂全集》，二为1900年刊本，三为1908年排印本《吴柳堂先生文集》，这三种版本都删掉了以上六处记载。



为何要删掉这六处呢？这在《慈禧外纪》中，译者的一段说明道出了原委：“勃氏（案系指濮兰德）原书曾引者录之。原书曾引，而坊间刻本因恐犯忌而删去者，译之。”就是说，濮兰德、白克好司著的《慈禧外纪》原书曾引用的吴可读日记《罔极篇》此处原文照译，包括坊间流传的刻本因恐犯忌而删掉了文字。这犯忌主要是怕触怒慈禧太后，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是该书译者陈冷汰，还有另一学者黄浚也这样认为：“柳堂之罔极篇，实记其母歿于围城事，其原本与《慈禧外纪》重译者，有详略之不同，盖柳堂叙及西后为懿贵妃时弄权专擅处，后来皆删去也。”濮兰德、白克好司著，陈冷汰译的《慈禧外纪》是在1910年10月首先用英文在英国出版的，原书名是《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文本是于1914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的。这本书中所收录的《罔极篇》就是包括删掉的六处记载的第四个版本了。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曾经的三个版本，分别出版于1893年、1900年和1908年。慈禧在世，又是中文本，怕犯忌而删掉这六处文字，是于情于理的。而《慈禧外纪》是英国人所写，先在英国出版，介绍到中国时慈禧已死去六年，由于清王朝已倒台，所以译者全文翻译就不怕犯忌了。吴可读，据说“少时颇倜傥，好狎邪游，不修边幅”。这样一位散漫的文人，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上一些听来的关于皇帝和后妃的传闻是极其可能的。当然，濮兰德、白克好司是怎样得到吴可读日记原本的，书中没有交代，我们也无从了解。因为怕触怒那拉氏及皇室，在慈禧当政之时而删去犯忌文字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

四

慈禧主张强硬对待洋人，与她“不知外国虚实”有很大关系，那时候可见其有仇外之心理，早忧庚子之祸乱，时之国力实已不堪。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懿贵妃对整个战争是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这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英法侵略是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

英、法、美、俄四国列强相互勾结，开展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攻占广州，袭扰上海后，于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法军舰炮击大沽口南北炮台，激战12个小时后，炮台被占，直逼天津郊区。为了诱迫清廷就范，英法军并没有占领天津。他们屯兵津门，胁迫清廷签约。五月十六日，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同英国公使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五月十七日同法国公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在这之前，分别在五月二日和五月八日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和美国公使卫廉



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并规定,这些条约分别由各国君主签署后,一年内在北京换约。这些条约是在侵略者的刺刀逼迫下签订的,是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英国公使额尔金供认不讳地说:条约是“一支对准咽喉的手枪”。

咸丰帝对这些条约相当不满意,对各国公使驻京一条极其反感。朝臣大哗,坚决反对公使驻京,纷纷上奏陈明公使驻京的危害。其中以吏部尚书周祖培所奏公使驻京八害折最有名。他们认为,这是“千古未有之奇闻”。并说:“乃若京师重地,许以久居,则彼将坚筑垣墉,暗列火炮,洋楼则以渐而增,不得不听其侵占。丑类则接踵而至,不得不任其蔓延。潜引奸民,广传邪教,我之虚实,彼无不知,彼之去来,我不能禁。”对外国公使驻京畏之如虎。因此,咸丰帝命桂良、花沙纳到上海与外国公使修约,并在上海换约,以使外国公使不能入京。然而英法公使在上海不同桂良、花沙纳见面,坚持赴京换约。他们派兵舰北上,抵达大沽口外,以武力胁迫清廷。咸丰帝见在上海换约不成,然后命桂良、花沙纳照会英法公使由北塘进京换约,不许其到大沽口。并“与约定人数,言明换约后不许逗留,不得携带军械,不得坐轿摆队,方可许其进京”。之所以不同意英法由大沽口入京换约,是因为大沽海口是战略要地,“布置均以周密”,严阵以待,由此入京对我国是不利的。然而,英法“名为换约而来,实系意在占据天津,借端要挟”。居心不良,是想凭借武力彻底打垮咸丰帝抵抗侵略的决心,从而在中国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益。

咸丰九年(1859)五月二十九日,英法等军舰强行攻战大沽海口,不断猛击我南北炮台。炮台将士奋起反击。此战结果是侵略军惨遭失败。清军击毁击沉英、法兵船十二艘,打死打伤英兵四百六十人,法兵十四人,英军司令何伯受伤,何伯的副手伤重致死。法军司令也受了伤。清军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胜利。

这次战役是英法侵略军蓄谋已久的。咸丰帝的上谕指出:“(英法)既为换约而来,并已许其进京互换,是中国已属尽情,毫无他意,何以反先行开炮,肆行骚扰?是伊先自背约,并非我之无信。”道理在我,义正词严。对此,远在欧洲的马克思非常明彻地分析道:“由于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换约的批准书日期之前向中国挑衅了。”

然而,这次胜利只是局部性的战役胜利,却不是全局性的战略胜利。胜利之后怎么办?咸丰帝仍然坚持“剿抚兼施”的指导方针。他在上谕中指出:

“唯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结,终无了期。不如乘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方为妥善。”

根据自己的实力,在一次战役胜利之后,而乘势寻求战略上的和平,这种做法不能



视为错误。

咸丰帝看到了英法报复的必然性。他说：“至夷情狡悍，来图报复，亦在意中。”所以，他一方面命令直隶总督恒福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另一方面严饬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加意防范”。同时亲调武成永固炮八尊给僧王使用。僧王在大沽口做了严密的布置，以资防范。一名为“赘漫野叟”的记道：“其于海港竖栅也，用铁工至五六百名，用熟铁至百数十万斤，历时半年始成。于各港内层层密布，谓夷船不能飞渡矣。其于海岸筑垒也，内外各竖合抱大木一层，加帮小木余层，中以牛皮囊实之，夯筑极坚，谓夷炮断不能攻矣。挖濠深广皆二丈，马队万难超越。截留浙省解京洋铜九万斤，添铸铜炮，增建炮台，不惜数十万之帑金，其区画未始不周密也。”说僧格林沁因狂妄自大而没有做认真的防范布置，简直是太冤枉人了。

但是，咸丰帝毕竟是泱泱大国的封建皇帝，他对自己的整体实力和防范措施估计过高，而对英法侵略者的贪欲和国力认识微乎其微。他说：“经此次痛加惩创，自应知中国兵威，未容干犯。”又说：“该夷蓄意狂噬，遽受大创，自应胆落。”还说：“朕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虽已周密，声威亦为该类所畏，原不难使该夷再受痛惩。”说这帮夷类经此“惩创”“大创”“痛惩”，就“所畏”“胆落”了，未免言过其实。咸丰帝夸夸其谈之言，确实有点阿Q的味道哩！

咸丰十年（1860）春，英法联军真的又来了。这次与上次不同，是做了充分的人侵准备的。他们的战舰和运输船二百余艘，军队两万五千多人，陆续抵达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事。六月十五日攻占北塘，七月五日攻陷大沽炮台，七日攻占天津。僧格林沁大军西撤，驻守通州一带，以保卫京师。而英法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夷众自天津进发，窃伺帝乡，迢迢三百里，毫无阻碍，故无恐怖”。他们一路烧杀抢掠，追到通州城下。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咸丰帝的“剿抚兼施”的指导方针呢？即战和并用的战略方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是有些道理的。光禄寺少卿焦佑瀛对这一方针做了解释：“驭夷之法，不外战抚两端，能战，则其权在我，而抚局易成；不能战，则其权在夷，而要求益甚，此理所必然，势所必至也。”就是说，战与和，第一位的是战。只有打胜仗，才能迫使敌方就范，换得和平。若打了败仗，那就得任人摆布了。即“剿抚兼施”的基点是剿。这个看法也是咸丰帝的观点。然而如何战呢？是快速决战？还是打持久战？这一点咸丰帝的看法则很模糊。他说：“唯念决裂之后，从此兵连祸结，迄无了期，虽图快于目前，而貽患于将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持久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怕“迄无了期”。又说“从来驾驭外夷，未有不归于议抚者，专意用兵，如何了局”。又是一个“如何了局”。他只想打速决战，而不想打持久战。这种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



由于咸丰帝所遇到的夷已经不是鸦片战争前的夷了，他们之间有根本上的不同。

一是社会制度不同。曾经的夷往往是处于落后的奴隶制阶段或与中国相同的封建制阶段，而现在的夷则是处于先进的资本主义阶段。

二是来往目的不同。曾经的夷来往多是为了通商，而现在的夷是为了侵略。

三是力量强弱不同。曾经的夷或是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或是臣服中国的四邻国家，力量往往较弱。而现在的夷则是怀着贪婪的侵略欲望，以先进的武器为主导，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的资本主义列强。

咸丰帝及其周围的枢臣们对世界的这个大变化是不清楚的，仍然以世界的泱泱大国自居。而咸丰帝统治下的中国已是国力衰弱、人心涣散、士气不振、外强中干、极贫极弱、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国家。《剑桥晚清中国史》说：“（清朝）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也就是对外国的现实一无所知，并且有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臭名昭著的证明就是，他们愚不可及地主张清政府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咸丰帝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二百年前的封建中世纪阶段。四夷宾服，万方来朝，是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咸丰帝及很多朝臣们习惯地把资本主义列强称为不屑一顾、不堪一击的“夷”。当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时，他们通常是主战的。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主战派常常是不谙世界大势的封建顽固官僚，也有一些是擅长纸上谈兵的英雄好汉。然而主和派一般地讲，通常是同列强打过交道，并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的比较开明的封建官僚。

那时候的懿贵妃便是主战的强硬派。《罔极篇》记载：“懿贵妃闻恭王与洋人和，深以为耻，劝帝开衅端，会帝病危，不愿离热河，于是报复之议遂寝矣。”由此可见，懿贵妃反对议和，主张硬打。《慈禧外纪》说：“慈禧此时已晋封为妃，京中人称为懿贵妃，凡关于外国之事，慈禧进言于帝，多主强硬。吾等亦不异之。盖吾人心中，知其幼年家世，所谓尊贵龙种，不知外国虚实，其强硬更何疑。”懿贵妃主张强硬，这与她“不知外国虚实”是的确有关系的。黄浚评道：“那拉氏在彼时不但主张帝当留，且当留而力战。一可见其仇外之心理，早伏庚子之祸乱；二可见其于当时之国力，实在不甚了了，徒知报仇，而不肯细察原因，比较力量。”懿贵妃主张坚决抵抗，这便是出于维护其地主阶级利益的需要，然而，这种反对侵略的积极态度则是应予肯定的。不过，懿贵妃那时候也只有二十五岁，且深居内宫，她对世界形势和国内情况“不甚了了”，也是实情。

五

当英法联军攻战北京,咸丰出京到热河,时年三十岁,病甚,慈禧益用事,参与政事,在北狩木兰的问题上,她非常有主见地提出镇守北京。

清代从康熙朝始,为了保持武功本色永盛不衰,也为了安定北方边陲,皇帝于每年四月(5月)率王公大臣,并且带领大批军队到此围猎比武,与此同时指令蒙古王公贵族轮班陪同打猎。史称木兰秋猕。皇帝来此驻蹕之所为避暑山庄,也叫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清朝皇帝在这里避暑,并从事各种政治活动。康熙帝共秋猕五十六次,乾隆帝共秋猕五十三次。乾隆在位六十年中,约二十年是在热河避暑山庄度过的。然而自道光帝以来有四十年没有进行了。“成庙始罢行幸,今日十年。”成庙指道光帝。

清帝秋猕热河一般是四月(5月)去,八月(9月)返京。但是咸丰帝却在八月要秋猕热河!

当英法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地直逼距北京只有咫尺之远的通州城下时,咸丰帝表示要亲自统领六师,直达通州。咸丰帝于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60年9月9日)发出朱谕:

“朕为近畿百姓免受荼毒,不得已勉就抚局,乃该夷屡肆要挟,势不决战不能。况我满、汉臣仆,世受国恩,断无不敌忤同仇,共伸积忿。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挾伐。着内廷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迅速定议。并有僧格林沁密折一封,一并阅看,本日奏事之外,大臣并著与议。特谕。”

这里讲述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表明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前线。我们不能说咸丰帝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容易沉湎于酒色的咸丰帝正在患病,“时皇上方病”。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件,有趣的是同时发下僧格林沁密折一封。这封密折是劝说咸丰帝木兰北狩的,立即准备内廷北撤。这两件事合起来很容易看出,直抵通州是做个姿态,而真正的意图是用暗示的方法向臣下发出他要北撤的信息。当时了解内情的官吏李慈铭在发出上谕的翌日的日记里写道:“闻上有幸木兰之意,已敕整备六军,假名亲征,实为行计。”亲征是假,北逃是真。这个方法是巧妙而圆滑的。然而大学士贾桢很快上了一道奏章,说明亲征不可轻试。他认为,亲征“非万全之道也,臣等以为断不可轻于一试”。并说“至于僧格林沁所奏木兰之说,尤多墨碍”。贾桢等不但不同意咸丰帝亲征,也不同意北狩,主要原因是一怕“人心涣散”,二怕“无险可守”。但是,他们是不是提出了“万全之道”呢?也没有。他们要咸丰帝“听其不可知





者于天命”，靠“皇苍所默佑”，就是听天由命。简直是开玩笑！咸丰帝对他们提供的安慰药方也没有兴趣了。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咸丰帝发下朱谕：

“朕察时审势，夷氛虽近，尤应鼓励人心，以拯时艰。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镇定人心，以期巩固。着惠亲王等传谕京城巡守接应各营队，若马头、通州一带见仗，朕仍带劲旅，在京北坐镇，共思兴鼓舞。”

前天还要直达通州，今天就改了主意，要“京北坐镇”了。这道上谕说明了大臣们的劝驾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坐镇京北，是选择好了一条逃跑的最佳路线。朱谕一下，然后准备车马，“宫中甚惶扰，已具车三百两（辆），申严将发木兰”。谕旨为“京北坐镇”，然而宫中却秘密传达“将发木兰”，咸丰帝玩弄的是两面手法。这时候京城内浮言四起，人心惶惶。大臣们纷纷上奏，“皆止驾劝行”。其中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吏部左侍郎匡源、右侍郎文祥、工部右侍郎杜翰的奏章更有针对性：“不意外间人言，更多疑虑，以为朱谕中‘在京北坐镇’一语，圣意仍属示木兰，众情益涣，岌岌可危！”并要求皇上，“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知木兰之役，决计不行”。大臣们的劝说，以及这道奏章起了作用。咸丰帝当天发下上谕：

“朕为天下人民主，当此时势艰难，岂暇乘时观省。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预行宣示，断未有銮舆所莅，不令天下不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所有备用车马，着钦派王大臣等传谕各处，即行分别发还，勿得尽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议而定人心。”

这是表明他决心不离开北京，车马发还，以息浮议，安定人心。

但是僧格林沁考虑得非常周到，说明何时撤退为好。他上了一道奏章：

“将谓圣驾出都，既有关乎国之安危，京师立即震动，士卒有后顾之忧，勇气既消，万难策励。此虽将士妄自揣度，亦系实在情形，合无仰恳天恩？既将来马头一带见仗之后，再定亲征之举，庶可维系人心，巩固根本。总之，奴才等折报频通，事尚可为。若奴才等万一先挫，彼时即行亲征，亦可不致落后。奴才等为保全大局固结人心起见，谨不揣冒昧，恭折密陈。”

这是说，咸丰帝目前尚无撤退之必要。一旦撤退，会动摇军心，挫伤士气。但是，也须做好撤退的准备。关键在于马头一仗的结果。如果胜利就不必北撤，如果失利就必须北撤。此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僧格林沁是前敌最高总指挥，他的话具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为此，咸丰帝于同日特下谕旨，说明“僧格林沁等所虑，正合朕意。现在巡幸之举，决计不行”。僧格林沁的奏折，给咸丰帝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又暂时决定不北撤了。并发内帑银二十万两，以鼓舞士气，打败夷兵。关于那时候的情形，吴可读日记载：“（咸丰）庚申（十年）七月，自慈亲（暗指吴可读之母）得病起，五六日间，即传夷



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章奏,概不发抄,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移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谓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这里说的正是当时僧王上奏,说明可暂不离京的情形。懿贵妃也是这样认为,主张咸丰帝当留京。这表明了懿贵妃在重大的政治举措中已经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了,并且也为人们所关注,否则不会记到吴可读的日记中。

但是,双方瞩目的八里桥一战,清军失利。八月七日(9月21日),英法侵略军攻下八里桥,直逼皇木厂,京师岌岌可危。当天晚上,咸丰帝听到了僧格林沁战败的消息,惊慌失措,匆匆忙忙,预备车驾。八月八日午前巳刻(9~11时),偷偷从圆明园北走。銮舆不备,扈从无多。他带着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焦佑瀛、杜翰等人,并其他随行者数百人,并且带禁军两千人保卫,仓皇出逃。这一天,咸丰帝只吃了两枚鸡蛋,第二天,也只喝了几碗小米粥。队伍行动迟缓,两天才走了八十公里,抵达密云县石槽。走了两天,粒米未进,禁军饥饿难忍,粮食又无处筹措,部队人心涣散。面对此种情况,王公大臣们没有办法,只能相对哭泣。户部的堂官不得已返回北京,想方设法购买了几千斤肉脯、果脯给大家分食,队伍才勉强得以前行。然而队伍所过之处,地方官吏纷纷逃散,食物没有人提供,皇帝拿黄金来换都换不到。据说,皇帝驻下后,御膳还没等做熟呢,士兵们就从锅里抢着吃,咸丰帝的仓皇出逃也真够狼狈的。

对于此次出逃,慈禧有什么态度呢?吴可读记道:“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人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我们不知道懿贵妃当时是否真的劝阻了咸丰帝,是否真的说了以上那些话。但是,我们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吴可读的记载。也许吴可读得到的是比较真实的消息。从过了一年之后的辛酉政变来看,懿贵妃是个很有主见的青年女子。

六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围绕是否斩杀英国侵略军翻译主任巴夏礼的问题,宫廷内掺杂最高权力的争夺,众人多各执己见,然而从此次事件中,人们已看出慈禧问鼎权力顶峰之端倪。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任英国侵略军翻译主任的巴夏礼是个不可轻视的重要角色。巴夏礼,英格兰人。他于1838年入中学,在校学习三年,于1841年来中国。巴夏